

第貳章：人格形成的背景（表一）

第一節：關於人格的理論

心理學在談論人格的時候，多半關心的是人類個別之間的差異性，也就是強調能夠區分個人與他人差異的一些特性，因此在這裏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將人格這一名詞定義為：“決定人們適應環境的行為模式及思維方式的特性”，在此定義當中，意味著個人慣於採取某種近似的模式去思考或者是行動，因此表現出來的行為往往具有一致性¹。

一個人的人格塑造具有許多可變的因素，像遺傳、父母的對待方式、社會文化、個人的生活經驗等等。

剛生下來的嬰兒，乍看之下是這麼的相近，但是由於遺傳因素的影響，每個嬰兒會逐漸表現出他們自己不同的特色，像智力以及音感

¹ 此觀念見於：西爾格德等著，張東峰、鄭伯壩編譯，楊國教授校閱，《心理學》，桂冠圖書公司，台北，民 78，3，25 十三版，頁 511。

之類的特殊能力，甚至是某些情緒的反應，都是可能因為遺傳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有些嬰兒比較好動，有些則比較文靜，有些嬰兒容易生氣，有些則比較具有耐心，有些嬰兒對新的事物很有戒心，有些則很自然地不怕陌生的東西，對這些孩子而言，像上面所舉例的原始脾氣，通常可以保持到他們十四歲之後（Thomas, Chess, and Birch, 1970）²，但並非絕對如此的一成不變，因為父母的對待態度如何，是具有誇大或是修正嬰兒原始特性的可能性。

大部分的心理學家都認同嬰兒在出生的時候就具有某些潛能，但這樣的潛能最終能發揮到什麼樣的程度，則完全看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所遭遇的所有經驗總合來決定。在此為了方便陳述起見，我們將人的經驗大致區分為二類：一類為人們共同的經驗，一類為個人特有的經驗。

所謂的共同經驗，主要是指大環境中的文化影響而言，就算是在不同的原生家庭中，也由於受到相同文化的薰陶，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信念、風俗、及價值觀，使得孩童在長大的過程當中，自然而然地學

² 此觀念見於：西爾格德等著，張東峰、鄭伯壖編譯，楊國教授校閱，《心理學》，桂冠圖書公司，台北，民 78，3，25 十三版，頁 511 - 512。

到共同文化所期待的行為表現；此外，在同一個地區內，儘管活在相同的文化環境中，但每一種文化都會包含著許多的次文化（subculture），而每個次文化在對道德價值以及成功的界定等方面，都抱持著不同的看法，於是，不同的次文化團體成員，就會受到不同的行為期待。例如選擇不同的職業，儘管界限並不是那麼嚴格，但個人的表現若符合社會職業角色的要求，的確可以讓個人在團體當中感到比較自在和舒服³。所以不同的次文化團體，會對人格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忽略這樣的背景，將無從瞭解人類行為⁴。

雖然在文化及次文化的壓力之下，會使個人產生相似的個性，但在同一個團體下長大的人，其人格不見得完全一樣，這是因為個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除了具有與他人的共同經驗外，還有一些個人的獨特經驗。

所謂的個人獨特經驗，是指非文化直接影響，與個人不同於他人所承受的所有經驗而言。造成人類行為差異性的原因，除了

³ 此觀念見於：西爾格德等著，張東峰、鄭伯璦編譯，楊國教授校閱，《心理學》，桂冠圖書公司，台北，民 78，3，25 十三版，頁 512 - 515。

⁴ 此觀念見於：Gerald Corey 著，李茂興譯，《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5，頁 173。

有生物因素外，如體力、警覺性、忍耐性等，還包含著文化傳遞過程中的變因，如傳遞者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習慣；又父母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以及孩童在成長過程當中所模仿對象的行為，也是造成不同的重要因素，雖然孩子不見得是父母的翻版，但從孩子身上，的確是可以看到父母的影響力；又，人特有的經驗也相當的重要，如長期輾轉床褥的人可能從別人的照顧當中獲滿足，並期望獲得幫助，這樣的期望會深深地影響到個人的人格結構；而父母的死亡可能會造成個人的認同中斷，因而喪失他所認同的目標；意外事件、見義勇為的機會、從比賽中獲勝、遷徙等經驗，都和個人的發展、成長有關，雖然這些經驗效果或多或少都會受文化的影響⁵，但我們卻不容易完全根據文化來預測這些影響的結果。

統合以上的共同經驗與獨特經驗對人格形成的影響力，接下來筆者透過一個人的成長歷程順序，去分析影響徐渭人格養成的主要原因。首先從徐渭的原生家庭談起，再陳述師長與同儕團體之間的影響力，最後更廣地去看社會文化的部分，至於徐渭在人生過程中更個人

⁵ 此觀念見於：西爾格德等著，張東峰、鄭伯壩編譯，楊國教授校閱，《心理學》，桂冠圖書公司，台北，民 78，3，25 十三版，頁 512 - 515。

的特有經驗與他的人格結構關係，將會獨立出來在下一章裏討論。

第二節：父系家庭的影響（表二）

一、 與父親的關係

父親的角色在男性成長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他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

當男孩開始踏出自己的步子離開母親時，父親幫助男孩真切地意識到自己與女性（母親）的不同，並且為孩子建構一座新橋，引導孩子探向母親以外的人際關係，使男孩學習如何從青少年轉變成一個真正的男人，這樣的轉變不僅是在體格上的茁壯，也意味著在情緒上能夠更加成熟，也就是學習當一個男人應有的性格與作為。

因此，父親的角色具有男性啟蒙、性別導向與性格認同等獨特的意義，就算是與男孩接觸最密、互動最多的母親也是無法取代的，就

如同父親無法取代母親是相同的道理。

如果，當男孩在“由母親的世界移往父親的世界”這樣的過程中，父親卻缺席了，這樣的缺席可能因為死亡，可能因為有意識的忽視，可能因為忙於工作、長期離家或甚而遺棄等等因素導致父親的缺席，讓男孩內心深處失落了一塊重要的拼圖，有著深深無以明狀的缺乏。這樣的缺乏引發了強烈渴望，趨使他（心中的小男孩）轉向生命中具有某種意義的重要他人，作為替代性父親的角色，以滿足內心的缺乏⁶。

這樣的重要他人，可能是一個人，可能是幾個人，也可能是一個團體，但最重要的是“他”或“他們”必須具有男性的特質才有滿足缺乏的可能，例如：宗教師（精神導師）、政治團體、具有共同理念的自治團體，甚至是大如城市或是國家民族等類，都有可能被當成替代性的父親⁷。

這些失去父親的男人將他們的忠誠投入在這些人或是團體身上，他們期待可以從這些替代者那裏獲得教導、忠告、智慧、警告以

⁶ 此觀念見於：John Lee, THE WOUNDED LOVER (Ally Press, 1995) P.4。

⁷ 此觀念見於：John Lee, THE WOUNDED LOVER (Ally Press, 1995), P.5。

及認同與讚賞，這些是他們無法從自己真實父親身上所能得到的⁸。

當然，他們所尋到的這些替代者們，並非每一個都能正面的提供父親角色的功能，有時反而給予負面的影響，使得他們失落父親的傷口和感覺更加強烈，而在人格養成上出了問題⁹。

然而，無論如何，對這些男性而言，因為父親的缺席，他們終其一生都會不由自主地尋找可以替代的對象(有的甚至試圖從女性中尋求¹⁰)，來彌補內心深處的缺乏，以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而完整的男人。

徐渭的父親是因死亡而在徐渭的生命中缺席。

在《畸譜》¹¹中對父親的記載只有二個，一個是「.....是年五月望，渭生百日矣，先考卒」這年是正德十六年，另一個則是提到五十九歲（萬曆七年）那年「秋，勞韓吳二賢改葬先考妣、兩室人」，那時徐渭已從牢中出來多年，他請人寫遷墓的銘文，而「大夫于予考按察使本誠翁為姑之侄，曩嘗同事於雲貴間，甚歡也。及是，予八十有二矣，渭以親好中及見大夫者止予一人在，題大夫墓非予不可，故來

⁸ 此觀念見於：John Lee, THE WOUNDED LOVER (Ally Press, 1995), P.6.

⁹ 此觀念見於：John Lee, THE WOUNDED LOVER (Ally Press, 1995), P.5-6.

¹⁰ 此觀念見於：John Lee, THE WOUNDED LOVER (Ally Press, 1995), P.7.

¹¹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1、6。

請題」，其於以上原因，徐渭請了父親的表侄，也就是他的的表哥王畿作《題徐大夫遷墓》銘文，但年紀太大，最後是徐渭自己代筆完成的：「大夫徐 ，字克平，喜竹，故稱竹庵主人。從祖戎籍，以弘治己酉雲貴鄉荐，始知巨津洲，至夔州府同知。茲以萬歷七年九月廿有六日再改葬于此（紹興城南十五里的木柵山），合以童、苗兩宜人，附以季子渭之母苗君¹²」，徐渭對父親的了解完全是由家人以及家族親友的口中聽來拼湊而成的。

二、與兄長的關係

父親的死亡，對當時只出生一百天的徐渭來說，只是一件被告知的事，儘管殘存有“曾被父親抱過”的潛意識記憶，但在情感上，對於父親死亡並沒有太明確的感受。

雖然如此，徐渭在成長的過程中，父親角色功能的缺乏，促使他不斷地找尋替代性父親，而他的兩位兄長則成了這個角色的第一順

¹² 徐文長，《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代題徐大夫遷墓》，台北，中央圖書館景印明萬曆會稽商刊本，1968。

位。

徐渭有二個同父異母的哥哥，由於父親是晚年得子，所以在他出生時，大哥徐淮已經三十歲，二哥徐潞也已經二十一歲，並且已婚，他們兩個人的年紀，尤其是大哥徐淮，都足以當他的父親了。

徐渭曾在《伯兄墓志銘》中陳述他對大哥的印象：「性古直，不逆詐，沉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¹³」，這樣的個性，這樣少笑容的表情，是一般傳統父親所表現的形象，「有長者風」表達了徐渭對大哥如同對長輩，更接近是父親般的尊敬，尤其在養母去逝之後，徐淮夫婦待他如同自己的孩子般照顧和培植，這更容易讓他產生對父親般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在徐渭的心目中，大哥的好並不只是個人的私心認為而已，而是獲得里中人們的一致認同。

基於對父親般的情感，徐渭總是盡可能看到大哥的好，然而在實際的陪伴上，徐渭卻有許多的埋怨，例如：「為客游，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鞠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

¹³ 徐文長，《徐文長全集》卷二十七《伯兄墓志銘》，上海，中央書店，民 57，下冊頁 109。

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于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游名山岳，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¹⁴」、「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構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金丹未成，玉顏曷駐？渭每念此，可謂寒心¹⁵」。

徐渭雖然肯定大哥的為人，但他重視朋友勝過親人的個性卻讓家中經濟出現危機，這樣的危機對徐渭造成直接的傷害，就是生母因家貧而被賣掉這件事，雖然賣掉這項行為是養母做的決定，但會導致這樣的結果，最初的原因卻是大哥的不擅理財，因此雖然徐渭在文字上並沒做任何明確的連結，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對大哥的怨卻是無法避免，除此之外，家道中落的結果也讓徐渭在往後大半生涯裏幾乎過著到處搬遷、寄人籬下的生活，對這點徐渭倒是不曾將它歸因於大哥的過錯，只是無奈感歎於自己的悲苦罷了；另外最讓徐渭不能諒解的，並不是家產敗光，而是大哥的死因，由於徐淮迷於道家的求仙練金，為尋師學技而長年在外遊歷，甚至在他死亡的前一個月還沈迷於和朋

¹⁴ 徐文長，《徐文長全集》卷二十七《伯兄墓志銘》，上海，中央書店，民 57，下冊頁 109。

¹⁵ 徐文長，《徐文長全集》卷四《蔣扶構公詩并序》，上海，中央書店，民 57，上冊頁 19。

友在稽山鑄鼎煉丹，最後竟因服食所謂的仙丹氣絕身亡，那年徐渭已經二十五歲¹⁶，他用了“寒心”這個字眼來表達對大哥死亡的感受，而往後他在研究道家修練之道時，主張重於內心的修為勝於外服的煉丹之術，這也是受到徐淮死因的影響結果。

謹管在情感上徐淮代替了父親的角色，但對徐渭而言卻是個“出走的父親”，他的缺席只比真實父親的死亡稍具真實性罷了。

至於二哥徐潞，徐渭對他的感情也相當深厚，只是他們相處的時間很少，在《畸譜》記載裏，八歲時，二哥曾引他去見府諸學官三先生曾蔚，在這次的見面中，徐渭受到很大的鼓勵；十歲時，正是家裏經濟衰落的關鍵年，那時他直屬的奴僕棄主而走，也是二哥帶他到衙門告狀處理的，在徐渭的記憶裏，和二哥互動最深刻就是這兩件事，而這兩件事對年紀很小的徐渭來說都是相當特別。可是到了十三歲（嘉靖十二年）的那一年「似十四兄潞往貴州¹⁷」。

徐潞參加浙江鄉試受到挫折，於是選擇與父親同樣的方式，利用祖上的軍籍離家遠去貴州參加那裏的考試，然而「考輒第一，衛諸生

¹⁶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4。

¹⁷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3。

忌之，相鼓告詐冒，其后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¹⁸」，之後又因「(徐渭)十四歲.....宜人訃遲，妨兄潞丁西貴州之科¹⁹」，二次的錯失，使得徐潞在貴州的生活陷入困境，只好靠著太太釀酒、為人縫補，而自己也常常入山販谷來維持家計，這樣的生活過了三年，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貧困的磨難，使得他的健康受到損害，在嘉靖十九年秋天的那場考試裏，突然得到痢疾，而且是病重到被抬著回家，甚至來不及等到考官²⁰的召見就去逝了，在徐渭《畸譜》中記載「二十歲，庚子.....秋八月，潞卒於貴州」，死得是如此的突然，那時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噩耗，直到第二年才「得潞兄訃，秋，兄淮至陽江，余隨之歸²¹」，當二嫂童氏帶著二哥的骨灰回鄉時，徐渭人在陽江，正在新婚快樂之中，對於這突如而來的死訊，心裏由喜到悲這種強烈的情緒衝突是可想而知，他在寫給二哥的墓志銘裏提到「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²²」，可見他對二哥的同樣的選擇卻有相反的命運感到不平和悲歎，就這樣二

¹⁸ 徐文長，《徐文長全集》卷二十七《仲兄墓志銘》，上海，中央書店，民 57，下冊頁 109。

¹⁹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2。

²⁰ 當時的考官是曾任紹興知府的洪公。

²¹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3。

²² 徐文長，《徐文長全集》卷二十七《仲兄墓志銘》，上海，中央書店，民 57，下冊頁 109。

哥在徐渭的成長過程中只存在到二十歲那年。

二個哥哥的死亡，都讓徐渭有著極大的失落，縱使他們常年在外，和他實際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他們對年齡差距這麼大的這位弟弟，可說是帶著父親的心情去對待與照顧，而對徐渭而言，他們更是有著替代性父親角色的功能，雖然在功能上對他並不都是正面的影響，但在感情上的深厚卻是不容置疑，一直到後來改葬父母的時候，由於經濟上結踞而無法重新安葬兩位哥哥和嫂嫂，「五十九歲.....改葬先考妣、兩室人，而未及兩兄嫂，至今以為缺事²³」，“缺事”簡單的二字，表達了他心中無限地愧疚和遺憾。

附：關於母親的影響

在母親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徐渭對養母的愛恨情仇。對一個失去丈夫的女人來說，很容易將重心轉移到孩子身上，再加上苗宜人自己

²³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6。

本身沒有生子，因此她能夠把徐渭當作是自己親生的孩子般疼愛，而孩子一方面受到更多的關愛，一方面則得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丈夫的角色幫父親打工，例如：保護母親，做家中男人應該做的事等等，因此在成熟度上會比同年齡但父母健全的孩子們來得成熟，雖然徐渭上面還有兩位兄長，但因年齡的差距，所以養母轉移的對象只有年紀仍小的徐渭了。另外，養母與生母之間的關係，一方面讓徐渭在幼小心裏就存有自卑，一方面養母賣去生母的行為也讓徐渭愛中帶恨：「教愛渭，世所未有也，渭百其身莫報也，然是年似奪生我者.....²⁴」，這些部分都對徐渭人格在日後常處在矛盾情結的狀況有所影響。

第三節：師友的重要性

在徐渭的《畸譜》中，他很詳細地把他曾經從學的老師列了十五名在“紀師”，又列了五名在“師類”，而在同儕團體方面則列了十

²⁴ 徐文長，《徐文長逸稿》附《自著畸譜》，淡江書局，民 45.6 初版，頁 2。

六名在“紀知”，因此透過徐渭自己的記載，可以看出在這些人在他的記憶之中所佔的角色和位置。

然而在這裏，欲談的部分並不是那些人對徐渭人生的某個點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是徐渭與這些人之所以會交為好友亦或是選擇他們為學習的對象，在某些特質上或是觀念上必定有所契合的地方。

阿德勒曾經提出所謂的“社會興趣”的概念，他認為在社會團體之中找到立足點、感覺安全、被人接受、及覺得有價值等等，都是人的基本需求。人們必須在共同活動與承擔責任中找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方式，當我們害怕不被我們所重視的團體接受，或是歸屬感不足時，便會開始有焦慮的感覺而產生許多的問題，因此人在兒童時期便已開始試圖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以期獲得一種隸屬感和貢獻感，所以人的快樂成功是脫離不了社會團體的。

又我們曾在父親的部分談到：當男孩在“由母親的世界移往父親的世界”這樣的過程中，父親的缺席會讓男孩內心有所缺乏，而這樣缺乏趨使他（心中的小男孩）尋求生命中具有某種意義的重要他人作

為替代性父親。

我們也提到這樣的重要他人（可能是一個人，可能是幾個人，也可能是一個團體）必須具有男性的特質才有滿足缺乏的可能，因此讓他佩服的學習對象，了解他的長才而在權勢上重用他的上司或是平行的朋友，與他能有詩文書畫往來的文人，能夠與他一同關心國家安危或是在戰場上保衛人民安全的武才之人，都是徐渭讚賞並願意與之結交的對象，當然徐渭之所以一直都保有對國家民族的重視與關心，這也是因為它們是作為替代性父親的對象之一。

又這些失去父親的男人們將他們的忠誠投在這些人或是團體中以期可以從那裏獲得本該由父親所給予的教導、忠告、智慧、警告以及認同與讚賞²⁵，因此說穿了，師友這樣的結構團體之所以如此重要，有很大的原因在於徐渭期望能夠從這些同質性的師友身上獲得足夠的認同與肯定，並且尋求屬於社會團體的歸屬感和成就感，這些都是他無法從自己真實父親身上所能得到的，更是做為一個人的基本需求。

²⁵ 此觀念見於：John Lee, THE WOUNDED LOVER (Ally Press, 1995), P.6。

第四節：社會大環境的影響

一、經濟與風氣

（一）江南地區

從明代的整個國家版圖來看，當時經濟發展最為前衛的地區，非江南與北京二地莫屬（見圖表三²⁶），北京是當時權力中心所在，在政治的因素下，經濟繁榮是必然的，但江南地區的繁榮，則是有它自身的內在因素。

1.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

明代所謂的江南地區，泛指長江以南蘇州府、松江府等為主體的一帶區域，以地理環境來看，這裏緯度較低，氣候溫和，適合作物的生長，而地型上多平原丘陵，湖泊以及河流交織成網，不但土壤肥沃，

²⁶ 摘自：張其昀監修，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上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民 69.6.12，頁 88。

在灌溉上便利，甚至在水上交通方面，不論是對內亦或是對其它鄰近地區，都十分方便聯繫，在這些優渥的先天自然條件下，蘊育了這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優質潛力。

從歷史的時空長流來看，所謂的中原一直被認定為中國的發源與發展的中心，但經過多次的戰爭之後，不論是外族的入侵或是國家的內亂，甚或是改朝換代，都或多或少逼使得一些平民小百姓為求避禍生存，紛紛往南方遷移，尤其是夾帶有幾次皇親國戚、貴族士夫等大規模的南移，如北宋的滅亡，南宋定都汴京，讓江南的經濟發展迅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歷史中的江南地區，對宋代及其以後的執政者而言，一直帶有由替代性角色轉變為政商重心的備胎情結。

2.經濟發展

明代建國之初，剛經歷過一場異族入侵與驅逐的民族聖戰，奄奄一息的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休養生息，重建國力，新朝廷期望在最短的時間內使經濟復甦、國力恢復，於是江南地區豐厚的天然條件被

視為帶動復甦的主要財力來源，故而特別對此地區採用加重賦稅的政策，以期作為其它地區的開發所需。

但對江南地區的百姓而言，並非每戶人家都像朝廷所設想的那麼富饒，戰爭對他們的傷害，再加上一些天災，如「景泰五年正月，江南諸府大雪連四旬，蘇常凍餓死者無算²⁷……」，「嘉靖二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眾²⁸」，「萬曆五年六月，蘇、松連雨，寒如冬，傷稼²⁹」，還有水潦、恒雨、恒暘³⁰、年饑³¹等等，對江南地區造成不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此外，還有徭役政策帶來人力的消耗，往往也包含著物力的損傷，如：解戶役的施行。尋常百姓一旦扯上糧長、解戶等類的差役，總是賠補損欠直到家破不已。而地方上的鄉官、豪強甚至腐敗的地方政府，更是運用權勢把稅役負擔轉嫁到一般百姓，使得重稅重役政策造成的破壞力量更為強化，於是形成有田無糧、無田存稅普遍不公平

²⁷ 張廷玉等著，《明史》第二十八卷，志第四，五行一，恒寒，台北，鼎文書局，1975。

²⁸ 張廷玉等著，《明史》第二十八卷，志第四，五行一，疾疫，台北，鼎文書局，1975。

²⁹ 張廷玉等著，《明史》第二十八卷，志第四，五行一，恒寒，台北，鼎文書局，1975。

³⁰ 張廷玉等著，《明史》第二十九卷，志第五，五行二，台北，鼎文書局，1975。

³¹ 張廷玉等著，《明史》第三十卷，志第六，五行三，台北，鼎文書局，1975。

的現象。

江南百姓們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為了生存，不得不在舊有的生產基礎上，發展出另外一套新的經濟形態，以應付生活上的壓力。他們有的在傳統農業之外找尋其它途徑做為補充，有的則是完全由土地游移出來淪為流民，許多的行業都是根據市場與日常生活的需要應運而生，像種植業、加工業、手工業、漁業、轉運貿易等副業，百姓藉此掌握農業之外的技能，爭取豐厚的收入，以舒緩經濟上的拮据³²，甚而為了充分利用勞力，「勤稼穡，故女亦從事蒔刈、桔槔，不止餉饁而已³³」，連原本只從事家務的婦女也都加入了生產行列。

(1)商品作物的種植

江南百姓在副業的經營上，首先是由農業出發的商品農業，種類有水果、蔬菜等等，除了一些專業的商人外，大部分的種植者都是依時將這些作物推向市鎮或是親自到市中販售，做一種短暫的商業買賣行為，不過為了增加收入，他們相當重視作物種類的經濟價值、消費

³²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1997.8一刷，頁50。

³³ 《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方面的時節性，甚至掌握節令所需，讓作物能夠及時供應，以提高競爭能力³⁴。像弘治年間，吳縣所屬東、西洞庭山所經營水果種植，在當地經濟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太)湖中諸山，大概以橘、柚為產……³⁵」，太倉人陸容在弘治初年就發現這裏「人以種橘為業³⁶」，「凡橘一畝，培治之功視田數畝³⁷」，儘管在人力和財力方面都比種植糧食作物多耗費好幾倍，但人們仍大量種植：「多或至千樹，貧者亦無不種」，這是因為種橘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栽橘可一樹者，直(值)千錢，或二、三千錢，甚至萬錢³⁸」。後來到了嘉靖初年³⁹，該地除了種植柑橘外，還添加了楊梅、枇杷等種類的水果⁴⁰。

(2)手工藝

在手工藝的部分，絲織業與棉織業在江南地區相當盛行，明初董良史的《擊壤歌》做了一些敘述：「催了機上布，便是囊中糧。饑寒

³⁴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1997.8一刷，頁55。

³⁵ 蔡升、王鰲，《震澤編》卷三，風俗，明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

³⁶ 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民86一版。

³⁷ 蔡升、王鰲，《震澤編》卷三，土產，明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

³⁸ 蔡升、王鰲，《震澤編》卷三，風俗，明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

³⁹ (明)樊深等撰，《嘉靖吳邑志》卷一一，太湖中洞庭山，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續編本。

庶可免，逋負亦可償。⁴¹」甚而「我吳民罔藉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糴饗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⁴²，於是到了嘉靖時便有：「產兼兩邑，而東城（指長洲的蘇城部分）為甚，比屋皆工織作⁴³」盛況。

又除了絲棉織業外，還有其它的手工製品，如：弘治年間記載有蘇州虎丘、滸墅的製席，蘇城齊門的藤枕，吳塘的柳箱（可作妝奩），長州陸墓鎮的扇骨等等⁴⁴。這個時候，由於經濟狀況已經復甦，人們的消費習慣有了改變，「市井多機巧繁華，而趨時應求，隨人意指⁴⁵」，「雕、鏤、塗、漆，必殫精巧⁴⁶」，業者根據市場的需求，日益將產品時髦與考究化，不再只是滿足一般的需求而已。

(3)其它

⁴⁰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1997.8一刷，頁54。

⁴¹ 楊樞，《淞故述》，藝海珠塵本，清嘉慶間（1796-1820）南吳氏聽堂刊本。

⁴² 蔣以化，《西台漫記》卷四，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⁴³ （明）樊深等撰，《嘉靖吳邑志》卷一四，土產物貨，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續編本。

⁴⁴ 《正德姑蘇志》卷一四，器用之屬，上海，上海書店，1990。

⁴⁵ 《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江南素有水鄉澤國之稱，捕魚是依地理環境而產生相當自然的行業，尤其是那些經濟困難的種田人家，當稻獲無法應付沈重的債務和賦稅壓力時，「採茆為薪，捕魚易米⁴⁷」便成了他們的額外收入。

除了經營副業外，從事商業買賣也是一種增加收入的手段，如在弘治年間的吳縣洞庭山：「土狹民稠」，「以商賈為生」，「民生十七、八即挾資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⁴⁸」；嘉靖年間的同府常熟縣所產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輸行賈於齊魯之境常什六。彼氓之衣縷，往往為邑工也⁴⁹」；萬曆年間蘇州府嘉定縣的棉布「商賈販鬻，近自杭、歙、清、濟，遠玉薊、滌、山、陝，而利至饒⁵⁰」等等。織造業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場，不只局限在江南地區，也靠著商人各地的往來而擴大到其它的地區，這些人的活動，不但為自己謀求生路，還具有帶動其它區域經濟流動的正面意義。

⁴⁶ 《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⁴⁷ (明)莫旦撰，《弘治吳江志》卷六，風俗，台北，學生書局，民76初版。

⁴⁸ 蔡升、王鰲，《震澤編》卷三，風俗，明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

⁴⁹ 《嘉靖常熟縣志》卷四，食貨志，中國史學叢書初編本，台北，學生書局。

⁵⁰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卷六，田賦考，台北，學生書局，民76初版。

3.社會風氣

人們思想觀念與生活習尚的改變，和他們自身的經濟狀況與整個大環境的改善有很大的關係。

明代初期的人們，因為社會經濟的復甦才剛起步，除了努力應付生存所需外，沒有太多的心思和餘額去做更多的要求和消費，因此儉樸的生活與保守的觀念形成當時的社會風氣。但隨著人們對工商活動的參與以及在財富上的累積，整個傳統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動，人們改業從事工商的眾多因素中，更多是出於豐厚利潤的誘惑，日益濃烈的拜金意識衝擊到傳統的倫理觀念，被重新塑造了性格和思想的新一代人們，為了追求更高的物質享受，三百六十行不管是那一行，只要是賺錢的管道，有利可圖，都可以不顧一切的為之，像正德、嘉靖之後「吳中風俗：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勞，豪猾之民為之⁵¹」，「工纂組，故男藉專業，家傳戶倩，

⁵¹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蘇上，引耿橘：平洋策，四部叢刊三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民 24-25。

不止自給而已⁵²」，而明代的高攀龍也曾經指出在江南地區出現了一些行業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的人，「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⁵³」，甚至青樓妓院的生意也非常興隆⁵⁴。

不過有趣的地方是，在這樣的風氣下，不但挑戰了傳統的經濟架構，也搖動了原有的社會層次結構，例如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雇主與雇傭的平等相稱，再再都顯示出開放的民主氣氛。

新一代人們的思想觀念是大量的賺錢，也大量地花錢，所有的階層都不由自主地陷溺在這樣的奢侈風氣之中。明中期的王文祿就提到當時的情況：「財利者，民之心、義之私也。由今觀之，貴亦求富而已」，「人皆慕榮華、爭名利，靜養性靈者無一人⁵⁵」，而在官方的記載上，成化年間，蘇州府吳江縣「習俗奢靡，愈趨愈下」：嫁娶上，「婚則豐盛而雜以鄙俚」；服著上，「庶民之家僭用命婦服飾，加以釵花、銀帶，恬不知愧⁵⁶」，到了弘治年間，蘇州城的情況更是「其俗多奢少儉，有海陸之饒，商賈並湊。精飲饌，鮮衣服，麗棟宇。婚喪嫁娶，

⁵² 《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⁵³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一〇，家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4。

⁵⁴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 1997.8 一刷，頁 231。

⁵⁵ 王文祿，《竹下寤言》卷二，良貴篇，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隆慶刊本，民 27。

下至燕集，務以華縟相高⁵⁷」，到了嘉靖時的記載：「迨天順、成化之際，民益富庶，復崇侈尚靡……迨於今（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崇棟宇，豐庖廚，溺歌舞。嫁娶喪葬，任情而逾禮⁵⁸」，而歸有光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前後記載江南奢靡之風時提到：「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⁵⁹」，「江南諸縣，土田肥美，多粳稻，有江海陂湖之饒……俗好媮，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饋遺，飲酒（燕宴）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於王侯⁶⁰」，而後萬曆年間，華亭人徐三重記載：「竊觀吳下貴室，田產動以千萬。所入既厚，即僭濫無度，華堂廣苑，聲妓肥甘，窮極縱恣⁶¹」，甚至在對待長輩的態度上「數十年前，後輩見前輩，必嚴重之。（前輩）有行義者，奉以為楷模。邇者漸成每老之習，即不得不貌敬者，背復嫻

⁵⁶（明）莫旦撰，《弘治吳江志》卷六，風俗，台北，學生書局，民 76 初版。

⁵⁷《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⁵⁸《嘉靖常熟縣志》卷四，食貨志，中國史學叢書初編本，台北，學生書局。

⁵⁹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四，王氏壽宴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常熟刊本，民 18。

⁶⁰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一，送昆山縣令朱侯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常熟刊本，民 18。

⁶¹徐三重，《採芹錄》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4。

笑之⁶²」，世風倫常敗壞已經至於此了。

在這種風氣之下，社會治安也亮起紅燈，嘉靖時「刁訟惟江南為甚，略無上事，百端架誣，蓋不受十狀而九也⁶³」，而地皮流氓結成“打行”，橫行鄉里，更是嚴重地危害到善良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⁶⁴，於是奢靡的風氣與惡化的治安，形成了社會的兩大問題。

4. 結論

對江南地區的居民而言，多種行業的出現與經營，一開始是為了繳納重稅、增加家庭收入而被迫形成的經濟形態，但雖著物質財富的累積，人們生活品質的改善，當初生存上的需要逐漸變成欲望上的想要，高度的消費習慣、奢侈的生活方式與變質的人情世故，都隨著經濟的好轉而衍生出來，並且藉著商業買賣地域上的移動也影響了其它的地區。

⁶²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卷二，疆域考下，風俗，台北，學生書局，民76初版。

⁶³ 海瑞，《海瑞集》上編，示府縣嚴治刁訟；示府縣狀不受理，《海瑞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一版，1981一版二刷，頁84。

⁶⁴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1997.8一刷，頁232。

（二）江南以外的其它地區

1.江南地區與這些地區的關係

江南地區的經濟與風俗的影響力就像是水波的觸點一樣，以放射狀的形式逐漸向外擴散。

工商業的興起，使得社會風尚有所轉變；而風尚的改變回過來又吸引更多的人們放棄本行而投入工商業的經營，於是這類人口的增長，促使生產與生活所需的原料、糧食、蔬菜等作物，不得不向臨近地區尋求補充，臨近地區不論是大地主或是自足的小農，為了迎合市場所需，增加收入，也改變傳統的農業經營，種植棉花，栽桑養蠶，生產商品糧食和蔬菜，讓自己和市場聯結起來，甚或是因為找尋較多的就業機會，而移往工商業中心造成勞力的增加，於是聯結的加強，也逐漸緊密了雙方的依附關係而形成了一種循環體系。

2.其它地區的概況

江南以外的地區，在受到影響的時間與程度上，彼此並不相同，像部分南直的徽州府，浙、閩、粵等地便是影響較早，改變較多的地區，而其它稍遠的地區除了個別小部分地方外，大部分的地方到明中後期，尚能保持原有的經濟特色與風尚，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包含的原因除了距離遠近不同外，也歸究於經濟連繫的緊密度以及和本身的內在因素有關。

這些地區雖然也有手工業，但不如江南地區的發達，於是在從事副業時，主要是利用地理與氣候等自然條件來做選擇，例如：嘉靖年間，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充分挖掘地方潛力，從事多種副業經營：「山居者或拾山繭作綢……亦頗種棉花為布。西南鄉以果樹致饒益；多麥收者好曲，交易以為利；亦或養蜂收蜜。懷資者或輦其土之所有走江南，回易以生殖，或販魚鹽。其西南山社無業者，或伐木燒炭，燒石作灰，陶土為器，負販以給徭役。近（縣城）社之貧者，大抵以菜為業，又或織葦若秫為席薄（箔），或編荊為筐筥，以供衣食；餅師、酒戶則鱗次於市，鮮不勤生者⁶⁵」，大致來說，有土地的農民種植水果、

⁶⁵ 張廷玉等著，《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李攀龍傳；屠隆：《由拳集》卷一九，沈嘉則先生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

棉花以及桑樹等商品性作物，靠輸出土產與提供手工業原料為生，而沿海地帶的流民則是依靠捕魚和樵採來維持生活；除此之外，從事商業買賣、從事城市服務行業和戲曲、評書等文化活動⁶⁶也是一種選擇。

在商業貿易部分，其貿易的途徑主要有二種：一個是將本地或是其他地區的原料運到蘇、松、嘉、湖等地，像山東兗州府「木宜木棉，賈人轉鬻於江南，為市肆焉。五穀之利不及其半矣⁶⁷」便是如此，之後再將蘇、松、嘉、湖等地所生產的產品運到家鄉或其它開發稍晚的地區販售，以賺取其中的利潤；另一個途徑是國際貿易，一些住在浙、閩、廣等沿海地區的商人，懂得將絲綿和綾羅等眾多種類的東西運到海上，和東西洋的外國人交換物品，再運回本地販售，這所謂的海外貿易是在嘉靖之後才日趨繁榮的⁶⁸。

透過商人南北往來的貿易過程，同時也將新的社會風尚帶回家鄉或是其它地區。可以明瞭的是，靠貿易行為而使經濟交流與江南愈緊密的地區，其在觀念和風尚方面所受的影響就愈大，反之比較傾向以

⁶⁶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 1997.8 一刷，頁 104。

⁶⁷ 朱泰、游季勳、裁正，包大權纂修，《萬曆兗州府志》卷四，風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一版。

⁶⁸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 1997.8 一刷，頁 92。

家庭為單位的商品作物種植地區，則容易保有原本的風尚與生活習慣。

例如：杭州在嘉靖中期已是「侈靡過甚」⁶⁹，萬曆時則更過之：「杭俗巧繁華，惡拘檢而樂游曠。大都漸染南渡盤游餘習，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餘以樂殘日……城中米珠取於湖，薪桂取於巖，本地止以商賈為業，人擔石之儲，然亦不以儲蓄為意。即輿夫僕隸，奔勞終日，夜則歸市餽酒，夫婦團醉而後已，明日又別為計。⁷⁰」，而當地人張瀚也形容當時的情況：「服食器用月異而不同已，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⁷¹」

而河南開封鄆陵縣在成化以前是「俗崇儉約，筵會無珍異之設」，但到嘉靖時則有了很大的改變：「婚筵喪奠，爭尚侈靡。廣招親朋，以哀儀物，甚至限錢幣之數以計豐嗇，飭廚召樂以賞相高。有喪之家，僧道兼用，倡優雜進。雖朝廷欽禁奢侈、士大夫奉行正而猶不能盡變」，萬曆時，王士性也談及河南某些地方「閭閻不蓄積，樂歲則盡

⁶⁹（明）沈朝宣纂，《嘉靖仁和縣志》卷三，風俗記，台北，新文豐，民78台一版。

⁷⁰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北京，中華書局，民86一版。

⁷¹張瀚，《松窗夢語》卷七，風俗記，台北，新文豐，民78台一版。

數糶賣以飾裘馬，凶年則持筐篋、攜妻子逃徙食⁷²」

北直與山東和山西等地「萬曆初，庶民穿脰靴，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俗咪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皂無非雲，屐醫卜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樑冠、披紅袍、系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⁷³」；山東兗州府滕縣城西地區，「不土著者眾，仰機利而食」，「淳龐之氣益漓浮薄，以至父子兄弟異釜而炊，分戶而役」，「其競相尚以侈靡。婚喪家有伎樂，納采奩、具殯葬之物以多為美。富家挽河汴之材，起高樓，廣堂室，飾車騎，鏤一鞍至費百金⁷⁴」，因屬於運河經濟繁榮區，因此萬曆時的消費已漸奢華。

不過在北直長垣縣的狀況又有些不同，此地雖然在嘉靖年間「喜豪奢而病儉嗇」，已經發生觀念上的變化，但在人情上「婚姻、死喪、患難相勸助，不重稱貸」⁷⁵，仍然保有溫和的風尚。

⁷² 王士性，《豫志》，學海類編本，清道光辛卯六安晁氏活字印本。

⁷³（明）樊深等撰，《嘉靖永豐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本，王毅敘錄 205 影印版，台北，新文豐，民 78。

⁷⁴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上，四部叢刊三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民 24-25。

⁷⁵（明）樊深等撰，《嘉靖長垣縣志》卷一，地理志，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本，王毅敘錄 205 影印版，台北，新文豐，民 78。

3. 結論

因此整體說來，江南以外的地區，在經濟繁榮度與風尚的改變上是跟在江南地區在走，其傳播的方向以江南為中心，呈放射狀向外，由城鎮向鄰近鄉村，之後又往周圍地區，甚或是更遠的地區擴散，歸有光對傳播的方向有過總結：「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他人）」⁷⁶，不論是那個階層的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新舊觀念的衝突，而逐漸融於整個潮流之中，只不過並非每個地區皆受到深刻影響。

二、知識階層的生態

市鎮居民為了生存而汲汲於金錢利益的追求，累積不少資本後，很自然地在食衣住行方面開始求取更好的物質享受，不論是富有人家亦或是中產階級、貧下之戶，都競相表現出物質生活的奢靡消費

⁷⁶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莊氏二子字說，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常熟刊本，民18。

習慣，這些情形在在都看在知識分子的眼裏，日子一久，很難不受到某種程度的刺激，當然，若把他們和一般平民相比較，知識分子在道德、倫常方面仍然有較多的堅持，但他們到底是活在相同的社會裏，多多少少還是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位於官僚體系中大半的知識分子，更是在權勢利欲的趨使下，欺壓百姓，飽中私囊，造成貪官污吏普遍的社會現象。

不過，在相同的社會環境裏，也會造就不同表現的人，文人階層的人們因為自我的意識與自我的期望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觀念和行為模式。筆者依據他們對人生目標的選擇，將他們分為二種人：一種是公開性利益追求者，一種是傳統儒家貞潔堅持者。

所謂公開性利益追求者，就是他們的目標明確：以努力追求物質享受與高度消費為生活目的。

成化年間，江南的知識分子階層便已「相尚以利，曾不為怪⁷⁷」，而晉江人蔡清提出「非是圖財滋殖」「絕不害義⁷⁸」的說法，更給這個

⁷⁷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六二，吳府君墓誌銘，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刊本，民 18。

⁷⁸ 蔡清，《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二，寄李宗一書，明人文集叢刊本，台北縣永和市，文海，民 59 影印本初版。

階層關財求利想法一個合理化的台階，到了正德、嘉靖時「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⁷⁹」，許多經商人家在累積足夠的資本後，便讓自己的子弟讀書參加考試，取得做官的資格之後可以享受一定數額的免稅權力，甚至可以利用職權增加財富⁸⁰，於是「居今之時，為父兄教子弟者，一切道德不論也，功利之途則誘而啟之⁸¹」，「勢利之薰灼，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恿、附利，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⁸²」，在個人與大環境交相感染之下，新生代的知識分子自然抱有“追求華屋、美田、嬌妻、僕從”的想法，作為他們的讀書做官的主要目的。

他們在學校就會「罷誦讀而甘佚遊，恥惡衣而不恥枵腹，至侮先生、長者以為無聞知⁸³」、「習於功利之私，而無真實之教誨⁸⁴」，進入社會之後，更是設法尋求各種謀利的管道，有的充任私塾老師，有的乾脆棄士從商，有的甚至做出賭博偷竊等犯罪行為，但對讀書人來

⁷⁹ 陳良謨，《見聞紀訓》，紀錄匯編本，明萬曆丁巳（45年，1617）江西巡按陳于庭刊本。

⁸⁰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1997.8一刷，頁226-227。

⁸¹（清）呂鳳藻修，《光緒永嘉縣志》卷六，風土志，引項喬《項氏家訓》，項系嘉靖八年進士，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

⁸² 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引懷慶府知府謝世修作《諭屬文》，此文當作於嘉靖間，紀錄匯編本，明萬曆丁巳（45年，1617）江西巡按陳于庭刊本。

⁸³ 《嘉靖寧波府志》卷四，疆域志·風俗，中國方誌叢書。

說，最冠冕堂皇的方式就是以科舉作為營利管道，「以仕為賈⁸⁵」，把作官當作從商，謀到一官半職之後以吸取民脂民膏為宗旨「……士大夫又多田。民有產者無幾耳，而徭則責之民⁸⁶」，「今之人也，操觚以試、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⁸⁷。」，這種價值觀迥異於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傳統的為官心態，因此造就了明代貪官污吏橫生的自然同化現象。

當然，粥少僧多競爭激烈，並不是每個讀書人都能實現這個理想，但受到“官高利多”的強烈趨使，反而使他們的努力更加積極，不論是在台面上或是在台面下的做法，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從進入學校開始，「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⁸⁸」，高額的學費成為一種投資；參加考試前：有人行賄考官，賄買謄錄、受卷和彌封的人；考試時：也有人交換考卷，請人當槍手⁸⁹，可說是「賄賂之盛行而數百金者為之，數十金者為之，甚而至於數金者亦為之。其有

⁸⁴ 王文祿，《策樞》卷三，舉逸，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隆慶刊本，民 27。

⁸⁵ 黃省曾，《吳風錄》，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隆慶刊本，民 27。

⁸⁶ 張廷玉等著，《明史》卷二〇三，歐陽鐸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

⁸⁷ 黃省曾，《客問》，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隆慶刊本，民 27。

⁸⁸ 王文祿，《策樞》卷三，舉逸，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明隆慶刊本，民 27。

⁸⁹ 此觀念見於：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文津出版社，初版 1997.8 一刷，頁 180。

擔石之儲，自乞人以上無不侈然為子衿者⁹⁰」，這整個過程所需花的費用是相當可觀的。到了有一官半職之後「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饋送急官賦，拜謁勤於職守⁹¹」，「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甚於一科。一月貨房，價有至四、五兩者；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多為（侈）美，爭相征逐⁹²」，「朝而釋蹻，暮而坐輿。未離筆門，遽賃廈屋。多製紈綺，濫收從人，宴頻繁，交遊博大⁹³」，「今被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屋，襲石綵椽，連薨別院，價至萬金者⁹⁴」，不論是要繼續賄賂上位者以求得更好的肥缺，或是為了表示身分而求物質的虛榮，在在都需要不少的花費，而這些花費的數目絕非是這些官職在台面上的收入所能負擔的，於是為了滿足這些消費，為了撈回以前的投資，利用職權謀利是他們增加收入最好的求財之道，當然，愈高的官職貪的來源愈多，貪的數目也就愈大，像嘉靖沈鍊彈

⁹⁰ 侯方域，《壯悔堂遺稿》（附《壯悔堂集》後）重學校，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民 24。

⁹¹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常熟刊本，民 18。

⁹² 馮琦，《北海集》卷三六，為肅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聖明嚴為申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明人文集叢刊本，台北縣永和鎮，文海，民 59 影印本初版。

⁹³ 李廷機，《李文節集》卷一，陳禮法以範始進疏，明人文集叢刊本，台北縣永和市，文海，民 59 影印本初版。

⁹⁴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一三，廉潔，引石語，台北縣永和鎮，文海，民 73。

効失敗的嚴嵩便是一例，如此層層剝削之下，平民百姓就成了整個貪官污吏體系中最下層也是最嚴重的犧牲者了。

然而，若以另一個角度而言，資本的累積、物質的享受、高額的消費習慣，在整體上可以代表著：經濟水準的提高、商品種類的多樣、人際網路的頻繁，顯示出這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裏，文人可以自由自在相互邀約遊玩於山水、聚會享樂為文於飲宴，在彼此交流、增廣見聞的影響下，造就了一批文人灑脫不羈的性格特徵，這種性格特徵的背後，埋藏有開拓意識與批判事物的潛力。

這批文人也把科舉考試當作他們人生中的一個目標並且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不同的是他們仍持有儒家憂國憂民的傳統崇高理想，希望有朝一日為官之時，能對國家民族平民百姓的福祉有一番作為。他們的特色多半學富五車，對科舉體制之外的古文產生濃厚興趣，涉獵許多領域的知識，並在許多方面表現出特有的才華，這當然與環境造就出博大雄心與豪放性格有很大的關聯。

這群人對當時的政治社會懷著遠大的理想而產生許多的不滿，並在文藝思想上，對科舉考試奉為規臬的八股僵硬形式感到壓倦，想在

古人思想文字的精華中找尋新的意念與感受，做為自己創作表現的養分，當然，這樣的理想與這樣的追求是和科舉選才的標準極不相合，再加上江南一帶文化水準高，人才雜會又名額有限的形況下競爭激烈，於是有的儘管比較幸運進入官場體制內，但因為理念不合，不願與當朝權貴同流合污，於是寧願有官不做，過著布衣的生活，像聘而不受職的沈周、上任即求辭的文徵明等等；但更多的是胸懷壯志、懷才求試的文人，最後卻流落到一考再考、屢考屢敗，如曠世奇才的徐渭以及一代解元的唐寅，他們最後的下場是與官場無緣，無法實現他們所期望“透過官職為民謀福”的崇高理想。

這些自認命運坎坷的文人雖然才華雄厚，但多數處在有志難申的處境下，經濟窘困的現實又緊接而來，於是他們帶著複雜的心情，掙扎於家庭生計與文人傳統傲氣之間，最終迫於現實的無奈必須有一份收入維持家庭生計，於是多數的他們兩相取衡下，退而求其次，選擇擔任上層為官者的幕僚或是門客，作為較為理想的職業。

這些懷才不遇的文人之所以可以找到幕僚與門客等這類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當時的達官貴人有這樣的需求，這是就業市場

的供需原理。

從嘉靖到萬曆年間，高層士夫階層間的往來，有互相交換名刺的習慣以及大量的公文書信往來，這對建立或增強彼此之間合作與利用的關係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性。對這些達官貴人來說，他們當初是藉著科舉考試作為晉身官階的途徑，他們熟悉的行文幾乎只限於八股文的書寫形式，而實際往來公文與書信的寫作方式與內容，則不是當初考試所學的八股文可以應付，於是為了讓自己不會在應用文章上自暴其短，找槍手幫忙撰文及書寫就成了一種快速解決問題的需要，進而變成了一種風氣。

再者，嘉靖後期，明世宗沈迷於道教，在宮內齋醮焚修之時，需要為神靈撰寫青詞，歌恭頌德表示感謝與敬意，而青詞的內容雖然很玄妙怪誕，但它在韻律方面的要求和詞是很相同的，於是「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眷者甚重。⁹⁵」、「工者立超擢，率至內閣⁹⁶」，像當時的閣臣李春芳、嚴訥、郭樸、袁煒等人就是因為青詞工巧為皇帝所滿意而入閣的。基於上行下效的效應結果，促使官僚系統階層中的人對詩詞

⁹⁵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列朝·嘉靖青詞，北京，中華書局，民86一版。

⁹⁶ 張廷玉等著，《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

的興趣與需要濃厚起來，在自己沒有能力的情況下，僱用文采豐富的代筆者合乎快速省事的效率，成了當務之急。

如此二大因素的影響下，幕僚與門客這二大行業在就業市場上，有著極需徵人的廣大空間。對這些懷才不遇的讀書人而言，因為他們對八股文僵硬形式的厭倦，使他們轉向對古文的學習，就是他們儲備本身條件的開始，除此之外，多數的人還善長詩賦書畫等方面，並大量閱讀百家子史等類型的書籍，這些廣博的閱讀正是撰寫應用文所需要的內涵，因此在符合上層士夫階層的需求下，這些在考場失意的才學之士才能把自己放入這個職場空間。

不過除了職場所用得到的才能外，這群飽學之士在個人生活與情感抒發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表現，像在嘉靖時，北方文人和貴族之間興起了雜劇、伎樂等屬於民間娛樂性質的活動熱潮，這些人便透過為雜劇和伎樂作詞、作曲、寫劇本等管道，做某種自由程度的鬱悶排解，例如：正德年間，西安武功人康海和戶縣人王九思即為一例，「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寧（九思）、康德涵（海）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留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為怪。」進而形成文人

間小小的潮流⁹⁷。

由於傳統文人的傲氣與使命感，這些飽學之士對他們從事幕僚與門客這樣的工作有著許多“為人作嫁”的不滿情緒，再加上原本性格中的豪放因子與顛沛流離、遭受磨難的生活經歷，使得這些文人帶有前所未有的思想矛盾和痛苦，於是他們表現出：極欲擺脫封建八股的束縛而想追求新的理想，卻又被保守的傳統勢力根深地固似地糾纏著；批評著科舉制度的腐朽和僵化，但卻又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應試；不屑高官厚祿的俗世利益而嚮往仙雲野鶴的生活方式，但又忍不住想和達官貴人接觸以使自己的才能和理想可以有用與實現於政治領域；主張人人平等，卻不時地流露出土大夫階層的清高與優越；表現著志行高軼、操履清白、高風亮節、忠義俠烈的品格，卻時常沈溺於過量酒精、借酒裝瘋、恃才凌物、戲弄權貴的情境裏。

這些種種矛盾，其實說穿了，只是反應出一種現況：就是這批人渴望在精神與物質生活中，尋求一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點。倘若順利找到平衡點的人，便可以安身立命的創造出屬於他自己的生存方

⁹⁷ 王世貞，《觚不觚錄》，寶顏堂秘笈本，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民 11。

式和環境，而其他不順利的那些人，便會在二者之間不斷的繼續渴望與追尋，不斷的掙扎又掙扎，長久下來，容易在精神或行為上顯露出失去平衡的一些特徵。

總之，不論原本對自我的期望如何，不論原本對人生的目標為何，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裏，最後都或多或少會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而在生活現實中做了一些選擇和妥協。